

比较

NO.6, 2012

63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张军

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

李稻葵 徐翔

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

罗杰·迈尔森

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干预的准则

安德鲁·霍尔丹 瓦西里斯·马德拉斯

狗与飞盘

铁木尔·库兰

伊斯兰教制度和中东企业家精神

韩博天 裴宜理

中国如何处理不确定性

安德烈·施莱弗 理查德·波斯纳 安东尼·尼伯莱特

法律规则的演进

孙国峰 芦东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中长期变动趋势

杜宁华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市场机制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No.6, 2012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63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63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86-3666-5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3607 号

比较·第六十三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666-5/F · 276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ng.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media.com

卷首语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年前改革遭遇巨大挫折，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计划还是市场，人们面对的是经济困局和意识形态的重围。直到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0条”改革纲领，并据此大刀阔斧地推行了整体配套的制度性改革，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宏观稳定，保持了平均每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普通家庭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转型的中国面临各种矛盾，以至于“危机”成为摆脱不去的巨大氤氲，令人焦躁和心情沉重。20年后的中共十八大宣示了改革的决心，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历史可资借鉴，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会实现如此快速而持续的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提供了增长的驱动力？这样的制度和机制是如何来的？本辑《比较》试图结合当前的经济状况，就这些问题和读者一起探讨，为思考下一步改革方略抛砖引玉。

开篇张军的文章试图用经济学逻辑，来解释过去2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加速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他认为，这一机制来自1994年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一方面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实现了财政再集权，使中央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调控能力大大增强，而且有助于奖惩地方政府的作为以及对结构改革的失利者进行补贴。另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为追逐增值税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而展开蒂伯特竞争。由于这种竞争，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是致力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及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人投资者落户，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朝市场化方向不断发展。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地方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而是因为土地公有制使土地再配置和基于土地的公共融资变得相对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财政”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尽管问题丛生，遭人诟病，但它们帮助地方政府克服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约束，是中国经济发展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李稻葵和徐翔的文章更多关注中国当前的结构转型问题。他们重新梳理了居民消费率、外贸顺差占GDP比重的统计数据，并利用二元经济的理论模型，估计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此来分析结构转型背后的机制。从中他们发现，自

2007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而外贸顺差占GDP比重则有趋势性的下降,这些趋势性的结构变化主要得益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这一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即使没有短期政策刺激,中国经济也可以实现自身的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应当对这一进程抱持基本的信心,同时,政策不应该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尤其不应该打破当前已经深入人心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

“前沿”栏目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的文章。迈尔森针对当前一些国家陷于国内动荡,国际势力干预这些国家的制度重建,运用四个方面的经济学文献阐述了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干预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多重均衡博弈中的焦点概念表明,理性行为可能会受到社会公认的约束和准则的影响,因此要形成最大共识的国家制度建设纲领;第二,代理理论表明,激励对组织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而代理人所能获得的激励一般来自上级监管者对其表现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与奖励,因此政治领导人本身应该是整个社会激励机制的最终保证人;第三,重复博弈中的声誉均衡理论表明,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必须遵循声誉理论给出的行为标准;第四,进入壁垒理论表明,降低政治竞选门槛可以使民主政治体制更具竞争力,因此还应该推动竞争来选出真正得到人民认可的领导人。他强调,探寻国际势力干预某些国家制度建设的一般原则,目的不是为这些干预行为辩护,恰恰是要减弱其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加强监管的呼声高涨。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加强监管,是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设置更多的监管规则,增加更多的监管人员,还是另谋他途?英格兰银行安德鲁·霍尔丹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观点:监管可能越简单越好,就像狗抓飞盘,依靠的是直觉而不是诉诸万有引力定律。他们利用经济学和金融学之外的案例,如认知成本、有限理性、简单规则和复杂规则对行为的激励效应等,解释了金融监管越简明越好的理由。然后,将这一思想与金融监管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行比较,并利用风险加权资本、金融风险建模等方面的实验,评估了金融监管体系是否越简明越好。正如他们所说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复杂的……对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也是复杂的……这样的组合带来了麻烦。就像不能以火灭火一样,不能通过复杂性来应对复杂性。因为复杂性产生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这需要基于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来做出监管应对。”

康奈尔大学的铁木尔·库兰教授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在这篇讨论伊斯兰教的制度安排和中东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中,库兰教授认为,伊斯兰教的某些制度安排压制了个人建立更大、更持久商业组织的动机,因而限制了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伊斯兰教的平等继承原则促使商人和投资者经营小而短暂的企业,抑制了发展非人格化交易技术的激励机制。伊斯兰教没有公司概念,阻碍了企业家创建更复杂的组织形式。有着庞大资产的宗教基金只服务于宗教目标,无法发挥现代金融体制的作用。这些组织局限直到现代仍然相互强化,不仅限制了企业家精神,还阻挠了商业

和金融领域结构变革的步伐。因此，要推动中东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更重要的是，从伊斯兰教的制度安排入手，来减少阻碍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羁绊。

德国特里尔大学韩博天教授和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的文章试图解答西方学者眼中的迷思：为什么中国在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仍能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处理不确定性的治理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不教条的、游击式政策风格。此风格始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年代，应对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环境不断形成的技巧。建国后，这套治理技巧很少被制度化或程序化，因此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起到关键作用，与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相比更具灵活性，也是使中国政府得以保持弹性的根本原因。但是，游击式政策风格的一些根本缺陷，如政治问责制缺失、行政过度干预及分配不当导致严重的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片面追求实现战略目标而忽略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等，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矛盾。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衡量中国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的一个重要指标。孙国峰和芦东的文章在储蓄和投资结构性变化的分析框架下，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 之比的变化趋势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从中长期看，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过了峰值并将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国将继续扩大或保持投资规模，因此经常项目将继续下降或小幅上升，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反弹。而这种趋势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内生变化、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然结果，与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活动的周期性萎缩关系不大。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安德烈·施莱弗等人考察了美国建筑业中“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原则”的演进过程，来说明法律规则的演进是否遵循效率论。他们对过去 35 年 461 个案例的经验研究表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原则的演变方式并非简单地遵循效率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有关普通法在商业领域具有或者至少趋向于可预见性和效率的观点。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研究市场设计的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和劳埃德·沙普利。上海财经大学的杜宁华教授，专攻实验经济学，对市场设计领域也多有研究，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并从市场机制设计出发，用养由基和恶来如何组织市场交易这个浅显的故事，说明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目 录

Contents

第六十三辑

- 1 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 张 军
Zhu Rongji Might Be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Jun Zhang*
- 31 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 李稻葵 徐 翔
Market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China'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by David Daokui Li and Xiang Xu*

前沿

Guide

- 46 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干预的准则 罗杰·迈尔森
Standards for the State-building Interventions
by Roger Myerson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56 狗与飞盘

安德鲁·霍尔丹 瓦西里斯·马德拉斯

The Dog and the Frisbee

by Andrew G. Haldane and Vasileios Madouros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94 历史上的中东企业家精神：伊斯兰教制度的影响 铁木尔·库兰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iddle Eastern History: Inhibitive
Roles of Islamic Institutions

by Timur Kuran

特稿

Special Feature

122 中国如何处理不确定性：游击式政策与适应性治理

韩博天 裴宜理

Embracing Uncertainty: Guer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by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142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中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分析：基于储蓄投资结构变化的视角 孙国峰 芦东

Predictive Analysis on Mid-long Term Trend of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Savings-investment
Structural Change

by Guofeng Sun and Dong Lu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62 法律规则的演进

安德烈·施莱弗 理查德·波斯纳 安东尼·尼伯莱特

The Evolution of a Legal Rule

by Andrei Shleifer, Richard A. Posner and Anthony Niblett

视界

Horizons

190 诺贝尔奖·市场机制·讲故事的意义

杜宁华

Nobel Laureates,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by Ninghua Du

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

朱镕基可能是对的

张 军

一、引言

应大卫·格林纳威（David Greenaway）主编的邀请，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世界经济》杂志年度中国讲座上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的一些认识。正是这个邀请让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不得不认真整理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片段。事实上，在 2008 年，时值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 30 周年之际，我曾受邀在诺丁汉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大阪工业大学等地，就如何诠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过几次演讲。在那些演讲的基础上，今天我才能够更系统地展现给各位一个框架，而且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更好地诠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来的发展经验。

2011 年 7 月 26 日，纽约大学的罗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在上海交

* 本文是根据我 2011 年 11 月 4 日在《世界经济》杂志年度中国讲座上的英文演讲经整理、修改和补充而成的。演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举行。我要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The World Economy* 杂志的主编 David Greenaway 教授的盛情邀请，也要感谢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姚树洁教授为促成这次讲座所做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范子英、陈诗一、罗长远、方红生、刘晓峰和唐东波在数据准备和处理上给予的协助。感谢出席讲座并对演讲提出问题和评论的所有人。文责自负。

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例如,尽管中国的出口值相对于GDP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更有意思的是,罗比尼教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于需求的构成,显然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方法。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并不能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站在需求方,断言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忽略了消费,无益于揭示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之所以大行其道,大概皆可归因于当下导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经济危机。由于过于强调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储蓄再一次被诅咒而不再被视为美德。^①尽管这种分析短期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逻辑并不能用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和预测,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也随波逐流呢?

那么,要阐释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呢?还是让我们听一下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怎么说的吧。他在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②中写道:

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核心问题是要弄清楚一个经济体从前的储蓄和投资仅占其国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如何能将其自愿储蓄提高到占其国民收入的12%或15%,甚至更高。之所以这是核心问题,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资本(包括资本中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的快速积累。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性事实。这没有错。消费占比的下降只是相对于GDP的比

① 例如,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Chen和Yao(2011)就使用了“The Cursed Virtu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作为题目。

② 参见Arthur Lewis(1954,第416页),“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重下降，并不是绝对水平的减少。遗憾的是，中国的统计当局没能在统计上处理好家庭的服务消费和“推断租金”（imputed rents）的问题，从而对家庭消费开支的核算存在系统性低估。^①即使这样，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 20 年也一直保持着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复合增长率达 8.6%，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则不到 3%。^②另外还需要指出，中国在过去 20 年来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国民储蓄率升高的必然结果，因为过去 20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升高主要是公司部门和政府的公共储蓄提高的结果，家庭储蓄率的变化其实并不显著。^③而非居民部门储蓄率提高（从而投资—GDP 比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 20 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所谓的“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a, b；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做了各种努力，试图找到答案。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把全国层面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了中国的各个省份，于是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有趣规律。利用地区的资金流量表，我们计算发现，上海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全国最低的，而经济贫穷的贵州和广西则是全国最高的（罗长远和张军，2009b）。^④这似乎是说，农业份额大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往往就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

① 自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场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 90% 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推断租金”，国家统计局只是使用家庭缴纳的维修基金和物业费以及房屋装修开支等粗略估计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根据这一估计，中国普通家庭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重仅为 7% 左右，显然低估了家庭在住房消费上的支出水平。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家庭服务支出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

② Arvind Subramanian (2011) 在最近出版的著作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译本《大预测》）中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人均消费的增长也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较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 20 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

③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占 GDP）大约维持在 20% 左右。而过去 20 年以来公司部门的储蓄率增长较快并且已经超过了家庭部门的储蓄率。

④ 例如，在 2000 年，上海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34.99%，而广西和贵州分别是 64.33% 和 60.85%。

份，劳动报酬占比就比较低。为什么这样？这不难解释，因为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 20 年，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结构变化过程中，农业占 GDP 的份额在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在上升，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认为，上述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开始从传统部门逐步被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从而实现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不用说，过去 20 年，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 GDP 中的份额持续增加，而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这意味着，随着劳动份额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国民储蓄占 GDP 的比重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东亚四小龙在三四十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今天不是。但是，它们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能在储蓄率高的阶段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人均收入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①

因此，过去 20 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地方面不平衡地推进是解释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和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不难理解，工业化显著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供给量又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就让资本的回报和政府的收入获得了更快的增长。我的这一解释有幸得到了卢锋（2006）一项研究的证实。卢锋发现，在 1978—1990 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

① 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做了一项研究，他用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样本，讨论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中低收入国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在他的回归方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出口占 GDP 的比重、基尼系数等变量都被作为影响因素。他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些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换句话说，从长远来说，这些变量并不是决定这些国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为它们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蔡洪滨，2011）。

增长率仅有 1.85%，但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其中 1991—2004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3.1%，而 1994—2004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 15.5%，均大大高于同期人均 GDP 和工资的增速。

二、过去 20 年工业化与资本积累的几个典型事实

你也许留意到了，刚才我多次提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是在过去 20 年里加速的。你会好奇，中国经济的改革始自 1978 年，为什么工业化（城市化）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开始加快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陈述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关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速的几个典型事实：

第一个典型事实是，资本形成的速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在 1979—1993 年，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只有一位数，而后开始加速，平均达到每年大约 13% 的增长。如图 1 所示，这使得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从 1994 年前后开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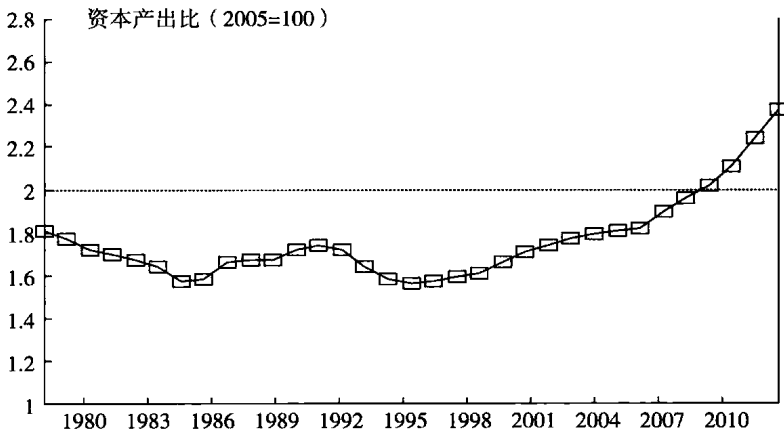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资本产出比的演变

注：资本存量数据是 31 个省级资本存量的加总，该数据序列来自张军（2008），陈诗一将该数据序列推广到了 2010 年。在形成本图时，作者用以 2005 年为基期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和 GDP 隐含价格指数分别对资本和 GDP 做了价格平减。

第二个典型事实由图 2 给出。在图 2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

历了跳跃式增长，成为资本积累加速的重要助推器。从那以后，以交通、通讯、能源和城市公共设施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改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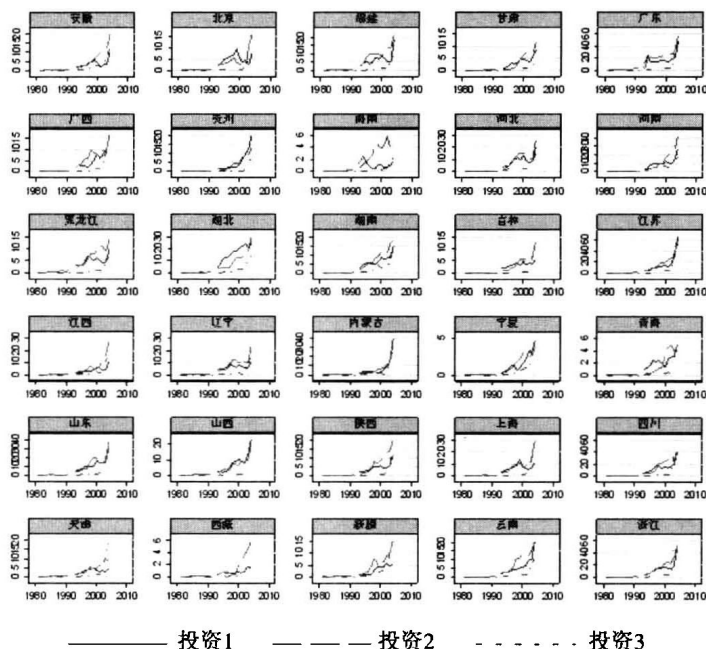


图2 1981—2004年各省基础设施投资变化（单位：10亿元）

注：投资1指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投资2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投资；投资3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另外，重庆市1997年及以后的数据并入了四川省。

资料来源：张军等（2007）。

第三个典型事实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大约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的，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中央政府在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中的资助比例则持续下降，过去10年平均只有10%左右（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主要不再是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而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社会公共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的建设。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成为资本积累的积极鼓励者和有力推动者。

^① 张军（2011）提供了过去20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及融资方式演变的详细介绍。在另一个经验研究中，张军等（2007）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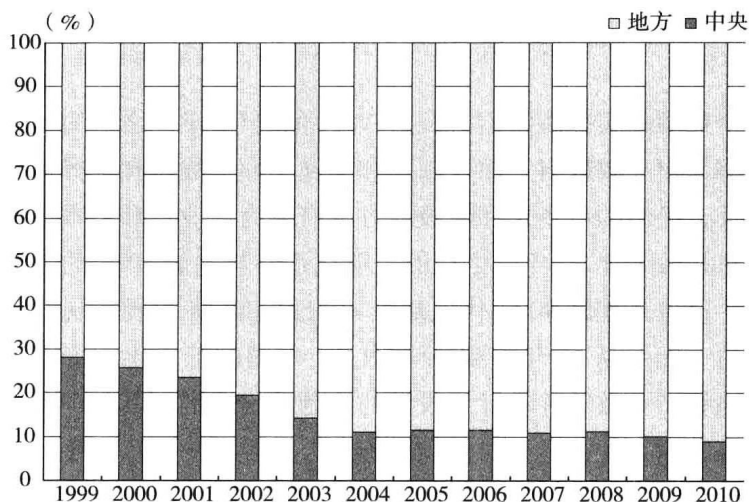


图3 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央—地方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第四个典型事实是，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白重恩、钱颖一和谢长泰，2006）。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结构改革使得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跨地区和跨部门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资本的分配效率在这一时期得到不断改善（Chen、Jefferson和Zhang，2011）。^① 因此，工业化和资本积

① 虽然经济学家中对中国的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持批评态度的并不少见，但对投资回报率做出估计的并不多见。在2006年前后，世界银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小组几乎同时开展的独立研究没有在总量层面上发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恶化趋势。那些批评中国投资过度的经济学家往往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尽管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否则就难以与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事实相吻合。也有较多经济学家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或ICOR，它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上升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有恶化的趋势，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了很多，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需要指出的是，ICOR对经济的短期波动非常敏感，因此，在计算ICOR时，必须使用较长时间跨度的平均值才有意义。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在2001—2010的10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的平均ICOR相比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的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10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几乎位于世界的最前列了（朱天和张军，2012）。

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 20 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

以上四个典型事实提醒我们，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结果，正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加速的有力推动者。正是后者让 90 年代之后的工业化道路与之前 40 年的工业化道路有了显著区别，这也是理解 90 年代之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一直是靠自上而下执行产业政策并在计划投资的体制里推进的，其教训是，自上而下执行产业政策的后果往往导致对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的严重不足，也导致更多的资本最先被配置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而不是去帮助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起飞。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 90 年代之后的这种工业化进程（从而资本积累）是在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框架里自上而下执行的，中国似乎难以避免再度发生因过度工业化和丧失经济效率造成的经济衰退。以此推断，90 年代之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资本的深化不可能是集权计划决策体制的结果。不是自上而下执行产业政策的结果，更像是市场、分权和政府间竞争导致的结果，因为没有以竞争为基础的有效的资本配置和让地方政府自主的激励机制，中国经济不可能在 90 年代之后因为工业化的加速和资本深化而保持持久的快速增长势头。

可是，作为提高地方政府自主性改革的内容之一，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和决策上向地方政府放权和分权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完成了，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 80 年代也就因此而存在，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发生在 90 年代之后？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 10 年，农业改革和乡村工业化（以所谓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为特色）无疑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这一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基本没改。但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尝试了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以财政包干制的形式将更多财政收入留给了地方。然而，整个 80 年代，虽然实行了财政包干并给予了地方更多自主权，但城市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速度依然缓慢。财政分权引发的更多是地区之间的市场封锁与分割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重复建设损害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国有企业受到保护，并最终在宏观上导致反复不断的恶性通货膨胀。